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过渡时期的

GUODU SHIQI DE JINGJI SIXIANG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日] 大河内一男 / 著
胡企林 沈佩林 / 译
朱绍文 / 校

经济思想

——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

现代日本社会
科学名著译丛

过渡时期的 经济思想

〔日〕大河内一男

胡企林 沈佩林

朱绍文

著
译
校

——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

(日) 大河内一男著；胡企林，沈佩林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ISBN 7-300-03684-8/F·1099

I. 过…

II. ①大…②胡…③沈…

III. ①亚当·斯密(1723—1790)—经济思想

②弗·李斯特(1789—1846)—经济思想

IV. 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476 号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

——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

[日] 大河内一男 著

胡企林 沈佩林 译

朱绍文 校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丰华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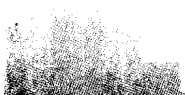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 3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000

定价：2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总序

为了实现祖国的现代化，“科教兴国”已成为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目标。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知历经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付出了多少代价。回顾人类近代化的历史，所有发达国家在走上近代化的过程中，无不以“科教兴国”为其先行条件。英国是近代最早走上产业革命道路、实现市民革命的国家，在受压迫的英国中下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推翻封建统治的时代，也是依靠划时代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看到英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伟大科学家的足迹。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一边是一幢古老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的名字命名的大楼；另一边是一幢以近代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命名的大楼，这正象征着一个国家要成功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实现国家的

文明、民主和富强，必须以科学的发展为前提条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也是为历史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美国、德国和日本，在 19 世纪落后于英国，在它们追赶英国，为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免遭淘汰而斗争时，也是首先认真地向先进的英国学习，引进英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缩短其落后差距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追赶发达国家的。然而在我国，往往侧重于引进属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机械设备，以谋求工业化，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轻视甚至忽视培养建立现代社会科学队伍。特别是在前苏联模式的时代，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位置，从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科学”的名称是在 19 世纪以后才获得公认的地位的。在 19 世纪以前英国的大学讲坛上，一般都使用“道德哲学”这一名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抬头，“道德哲学”已不能涵盖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发展，“社会科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通用的科学名称。社会科学在 17—18 世纪初得到了大发展。例如，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于 1651 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1690 年；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 年；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1755 年；《社会契约论》，1762 年。在经济学方面，魁奈的《经济表》，1758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 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 年；休谟的《大不列颠的历史》，1754—1757 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 年，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科学”是促进市民社会发展的新兴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问题和劳资纠纷也日益显著，从而也就出现了表达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的著作，所以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科学，因而

必然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 17、18 世纪的几部经典名著，是受尽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皇权、神权和城市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而奋起求解放的中下层人民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们都是寻求“人的解放”的科学指南。任何时代的进步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都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作为经典的价值。社会科学的进步也仍然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扬弃和创新。

所有落后的包括 19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向先进国家奋起急追的时代，无不大力引进、消化和应用英、法等先进国家的社会科学。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教授对一位日本年轻的经济学家说，“日本人勤奋，教育水平高，吸取别国长处的能力很强，只要回顾一下明治维新以来就可以看到，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很好地从国外学到了很多，这很像 19 世纪的美国。”（见 1999 年 11 月 23 日《经济学人》。）事实上，明治维新以来，明治政府的宣言中的“五条誓文”中就有一条“广求知识于世界，大振国基”。100 多年来，日本被公认是世界“翻译大国”。直到今天，只要世界上有什么新的著作问世，不问其流派，不出一两个月日译本就出版了。特别是古典著作的翻译更是精益求精。例如，《资本论》的译本由权威专家翻译的先后就有五六种之多，其中的译者注释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译本。《国富论》的译本也是如此。古典文学、哲学等译本也是不断推陈出新，并以“文库版”的形式廉价出售，十分普及。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现代日本的社会科学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虽然日本的经济学家尚无人获诺贝尔奖，且是一个不足，但要知道日本原本是发展中国家，它要追赶发达国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吸取别人之长，使之本土化，以增强综合国力，当然就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有条件执国际经济理论研究之牛耳。何况像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并不真正代表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权威，在评奖中亦有偏颇。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人们无不痛感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之不足，而来自 21 世纪的各方面的挑战，又亟需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知识。日本原为东方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着更多的类似之处，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它的现代社会科学对我国有许多实际的参考价值。多年来，我们偏重于欧美，而疏于近邻。为了广求知识于世界，对近邻日本，我们更需要深入了解。

我们组织编译这套《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正是力求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译丛所选的名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著作，而是现代日本学者所撰写、得到社会公认并对我国现实有参考价值的科学著作。本译丛获得了王洛林教授、堤清二博士和生野重夫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大力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博士给予了热情支持。由于现代日本社会科学的范围很广，我们的知识见闻实在有限，衷心希望国内外的朋友给我们以帮助和指正，共同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为整个人类做贡献，则幸甚矣。特此为序。

朱绍文



中译本序

在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教科书中，大多将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看做是两大对立的经济思想体系的理论代表，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代表，而李斯特则是国家干预主义、保护关税政策的理论代表。人们几乎把这种理解视为不容置疑的，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多加分析。但是这种传统的教科书式的理解却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位伟大的理论家的理论，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所担负的时代的历史课题，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他想为那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而呼吁的努力。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中所包含的政策也必然是为这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的关系，就不一定会将二者的关系看做同一平面上的对立的关系。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代表的都是本国的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都是在不同时代各为其祖国新兴产业资本利益奋

斗的具有共性的伟大的经济学家。

18 世纪的英国，广大中、下层人民在皇权、贵族、神权和城市行会等封建统治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下，没有自由；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者、农民和工匠等生产阶级得不到自由发展的社会地位。为了当时英国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为了英国新兴产业资本的发展，亚当·斯密大声疾呼，要求给他们以“自由之手”（free hand），并提出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所以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像宗教的教义，而是代表英国新兴生产力的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新兴产业资本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规律那样普遍适用。而 19 世纪的德国比英国远远落后一个世纪，当时的德国封建势力领邦分割，领主跋扈，关卡林立，北方的城市商业资本与英国的产业资本建立了牢固的贸易联盟，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的政界和经济学界。而德国南部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当时正深陷于德国封建势力的控制和束缚，受到北方商业资本和英国进口商品的压迫，难以发展，更难以形成近代的国民经济和统一的国内市场。李斯特鉴于“德国当时的现状”，为了“祖国的利益”，对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保护国内幼稚的民族工业，反对封建统治，要求政治自由，强调对外要保护民族工业，对内要有市民自由，待德国的产业资本具备了国际竞争力时，再逐步开放，实行自由主义贸易，开拓国外市场。李斯特在晚年甚至提出与英国建立联盟，共谋在世界市场上各得其所，控制殖民地以保护国内产业资本的利益的利益的主张。可见，李斯特和亚当·斯密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都是为了各自国家新兴产业资本和它的主体代表产业资产阶级从受压迫、被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的革命家，都是反封建的、革命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任务是为新兴的中、下层市民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作为发展中国家，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的经

济理论正是我们应该重视和认真学习的经典著作。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与当年亚当·斯密为英国，李斯特为德国所奋斗的历史课题正好相似，即要解放中、下层人民的生产力，开展产业革命，建立现代的国民经济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以追赶经济发达的国家。所以学习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本书由东京大学经济学部著名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教授在1940年前后写成，当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猖獗，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结盟，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时期。日本国内军事法西斯专政，自由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受到监视和镇压。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教授中，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全部被镇压，被赶出大学讲坛，就连主张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河合荣治郎教授也因写了一部《反法西斯》而受到文部省的迫害，被起诉而离开东大。大河内一男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劳动经济理论的权威，社会政策科学理论的创新者，他的劳动和社会政策理论在日本被称为“大河内理论”。由于受到法西斯当局的监视，他不能在大学里讲授社会政策，只好改讲经济思想史。本书就是在这个时期作者分析斯密与李斯特的理论如何为中、下层人民争取自由，指出现代市民社会如何才能获得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著成的。书中并未就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但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两位伟大经济学家理论的核心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希望读者在联系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耐心地研读本书中关于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理论的有关内容，我相信定会大有裨益。为了突出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理论特征，故将本书中译本的书名由原著名《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改为《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师母大河内春枝夫人和师弟大河内晓男博士欣然允诺中译本的翻译，感谢他们帮助我向出版《大河内一男著作集》的青林书院新社说明中译本的意义；对青林书院新社的逸见俊吾先生和大塚和光先生欣然允诺中译本的出版，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周蔚华和陈莹同志冒着酷暑，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中译本中略去了原著中小林昇教授的“解说”和“附论”中的最后一篇。中译本中如有疏误之处，敬请指正，不胜感激。

朱绍文

2000年7月



著作集序

本书第一版是昭和十八年（1943 年）问世的。当时日本已经明显地开始走向“破局”。就在这年 5 月 21 日，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在空战中死亡；同年 5 月 31 日，新闻报道“日军阿兹岛守备部队全军覆没”。就连对一切事情都抱乐观态度的德川梦声在他的《梦声战争日记》（第 2 卷，1943 年）中也写道：“——日本怕是快要完了吧？常常有这种感觉。”因此，像《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这类学说史的研究著作，竟在纸张受配额限制的条件下获得出版，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统治经济管制下，一切不紧急的需要都得暂时放在一边，而像本书这样的著作完全可以说是“不紧急中之最不紧急的了”。

为什么本书以《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为名出版，这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已经说明。这里使用“与”，看来好像这两位经济学家是对立的，而且经济学说的研究人员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时代课题，在这个意义

上，这里的“与”有将他二人相结合的意思。日本传统的亚当·斯密研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意义，而只是教科书式地在进行研究。此外，社会学家们则从新的广义的立场来研究亚当·斯密的体系，而很少有人尝试将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将古典经济学派和历史学派同它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相互结合，来开拓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德国纳粹统治时代，又从另一方面开始了“李斯特复兴”，李斯特以外的历史学派的重要性又重新获得了“复兴”。但是其重点仍是把李斯特看做国民主义经济学家这一侧面，强调的是作为亚当·斯密批判者的李斯特的重要性，主要阐明他的“国民体”（Nationalität）的经济学的意义。对于这种意识下的所谓“李斯特复兴”的政治目的，我深感不以为然。《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不是偶然地将对两位经济学家进行研究所写的论文编辑而成的一本书，本书的重点在于说明这两位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的共通性，是从把李斯特看作德国的亚当·斯密这一角度和观点进行考察的，同时通过他们的经济理论的背景来探求其所代表的“人”的类型。

研究李斯特，问题的焦点是他的“国内市场”论，一切经济政策的理念是德国资本要掌握自己的“国内市场”，同时要能切实做到这一点。这对李斯特来说是将来要实现的问题，而对亚当·斯密来说，则是已经实现了的事实。我在本书斯密研究的末尾部分增加了一章“亚当·斯密和工资”，用以明确斯密对工资作为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这一问题是何等重视。在这一点上，斯密与李斯特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同时从这一视点来研究斯密的工资论才可能明确斯密的工资论绝非单纯从道义上主张提高工资，也不是高工资的利己主义思想，而是要强调一方面提高工资可以确保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高工资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种族来说，在独立的生产者的小企业衰亡之后，“自由的”工资雇佣劳

动者形成了一个阶层的前提条件下，它可以确保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产生一种契机使经济社会得以顺利地进行良性循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斯密的工资论与“社会政策”有着深刻的相互联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了 20 多年，日本的斯密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斯密的考证有了很大进展，对斯密研究的角度也更广泛，例如，从斯密与重商主义的关系去研究，或者从“道德哲学”的历史中去评价，这种倾向性非常强。在战后的日本，不仅有很多斯密研究家，而且有由专家和爱好者共同组织的“斯密学会”这类广泛的学术组织，可以说日本的斯密研究在国际上也居于很高的水平。本著作集中所收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这本《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可以说为战后开花的日本的斯密研究和李斯特研究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黑暗的战时条件下，我们拼命地努力不让学问的传统中断，这一点是确实的。我的这种想法很强烈，所以在这部著作集中把我战前的这本代表作也收录进去。很多学生和青年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空袭很厉害的时候，在学生勤劳动员的时代读了这本书。什么叫做学问，恐怕在这种时代才最能理解。与当今杂书泛滥，谁也不去读书，谁也不去思考的大众化的读书时代相比，当时的我们可以说是幸运的了。现在重读本书，不禁感慨万千。

大河内一男

1969 年 7 月



初 版 序

再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新的经济伦理的时代，也再没有像今天这样经济伦理如此混乱的时代，同时再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有新的经济理论的建立，也再没有像今天这样经济理论失去了它的方向。所有这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经济建设一天天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而经济伦理尚未能成为足以推进这种经济建设的主体的力量。经济理论好像可以无视这种新的经济秩序的成熟而独自成为理论，于是只得一味去追随将其作为指南，或者堕入毫无积极性的单纯的批判主义，否则就是把理论的课题完全技术化。人们将经济伦理与经济理论看作是平行线，以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而置之不顾。根据经济伦理与经济理论所指示的方向毫无关联地列举一些道德原则，来说明经济道义，于是人们认为经济伦理必然是从外界对经济生活所施加的某种规范，但是，我们的任务是从经济生活的“内在”中抽象出伦理的存在，去锻炼人们的道义。经济伦理的目的不是要以锐利的眼光对人们的日常经

济生活加以种种规范、制约，而是努力地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符合国家所要求的最合适的经济生活秩序。问题在于要从经济的“内在”中，从经济的行为中迸发出这种努力的热情。因为经济理论本来的任务并非停留在对现有的经济现象作出分析，也不能满足于从数量方面去分析价格现象。而今经济理论必须以理性来鼓舞迈向新的经济生活的积极的热情，支持树立新的经济秩序的像火一般的意愿，必须成为促进新的经济生活的力量，否则，就不能说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学问忠实于当前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对于旧的经济理论，其技术性越强，我们越不能认为它还有几分可以说明当前剧烈的转变和建设的像狂飚一样的过程，在技术上利用它的这一片断或那一片断来说明问题。对于过去的这些理论，更需对其隐藏于体系背后的人性观和经济观进行分析。如果所谓的理论经济学主张它与这类观念无关，而纯属于另外一种秩序，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就必须来分析一下这种主张是什么货色。

笔者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受到无限的深刻暗示，经济伦理必须是从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所产生，因为所谓经济理论必须以某种形态的经济伦理和一定的人的类型为前提，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尽管好像对这一事实毫不关心，但近代的经济学发展无不在无意识中以这一前提作为经济学形成的基础。以鲜明的态度直率地表述这种关系的人就是亚当·斯密。经济伦理和“经济人”最初包含的社会意义，以及它们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日常生活的现实感日渐衰退，于是人们以为理论的形成可以离开这些前提条件，渐渐地经济理论就丧失了富有生气的革新精神。事实上，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的价格经济的飞跃发展，使经济伦理成为无用的东西，最多只是从经济的“外部”给它加上板着面孔的时而又软弱无力的伤感主义的烙印。英国的自由经济对其自身世俗的潜藏在其内部深处的精神根本毫无察觉和反省，完全忘记了亚当·斯密所表述的鲜明而有生气的经济伦理的意义，满足于英

国经济的安定和经济秩序的建立，因此虽然英国人面临着经济生活的对内和对外的转变要求，但他们却不敢提出潜藏在经济生活深处的人的精神和人的本身的问题，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勇气。如果他们对保持英国式的经济秩序作为惟一的政策并不感到奇怪，则根本不可能深切体会到经济伦理的意义和“经济人”的局限。直到今天他们仍不可能体会到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英国古典学派经济理论所具有的现代的伟大的祖师的意义。

“回到亚当·斯密！”是人们经常提起的口号。在当今旧的经济秩序正在转变，新的经济秩序正在建立的时代，必须重新从被人们经常提到的这一口号中寻找新的时代的意义。当斯密执笔时，必有人在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不以这种社会人和由他们构成的人类社会为前提，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根本不可想像的。经济理论与经济伦理——虽然斯密本人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二者是不可分的，对于斯密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经济理论离开经济伦理不可能得以形成，而经济伦理离开经济理论所指示的方向，则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力量。但二者并不能这样简单地统一起来。在斯密的理论中，理论、政策与历史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离开政策的实践目的就不可能有理论，也不可能使历史的叙述有任何意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无穷魅力就在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性和统一性之中。但并不是说斯密体系中的经济伦理在今天仍然原封不动地适用，正像弗·李斯特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斯密的体系中只有个人和市民是经济生活的主体，而国家和国民却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斯密在明确能真正推动经济生活的经济伦理时，只是在日常经济生活的“内部”茁壮成长这一点上，斯密的深刻性就远非历史学派从经济生活的“外部”去寻求经济伦理的存在所能比拟。今天在探求新的经济伦理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从斯密将经济与伦理二者相结合中去学习，并考虑如何去超越他呢？在创建